

【农村·农民·农业研究】

村民是如何化解环境健康风险的?

陈阿江,程鹏立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污染—疾病科学关系不清及制度安排问题等因素致信息不全,加之村民相关科学知识的缺乏,是村民环境健康风险认知的根本性障碍,但村民并没有如简单预设的那样处于“束手待毙”的状态。在乡村社区,村民利用“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把有限的信息无限利用,有效地应对了信息不全的困境。面对外源性污染,并且无法改变污染现状的格局下,村民根据生活经验和常识策略性地化解健康风险。村落社会中的亲缘、地缘关系结构以及精英—大众结构也影响了村民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规避。村民化解环境健康风险虽然缺乏成熟的科学指导,却有其独特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健康风险;“熟人社会”;信息利用;化解;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1)02—0027—06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快速推进,致使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进而对公众健康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媒体频繁出现的“癌症村”、“怪病村”等,表明了我国目前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导致健康风险的严重程度,也说明了公众对环境健康风险的关切程度。环境污染引起的公众健康受损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环境污染所致的健康风险很大,一旦致病,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及经济、社会影响都非常大。典型的案例如日本的水俣病。^①据统计,日本水俣病的受害者合计达到37,360名,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直到1997年5月,对水俣病受害者的赔偿金问题才算基本解决,然而,水俣病所致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近年来,中国因环境污染导致疾病高发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

媒体广泛报道的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沿岸因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出现多个“癌症高发村”^[2];盐城某个村庄因饮用水和空气受到严重化工污染,村庄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癌症村”。^[3]此外,还有近年陕西凤翔的“血铅事件”,云阳宗海“砷污染事件”,等等。这些事件足以表明我国环境健康风险之高。

但是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对环境污染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环境健康风险的认知却十分困难。这种认知的局限性,既有科学发展阶段中科学认识本身存在局限性的原因,也有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及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就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言,无论是在生物医学,还是在流行病学研究方面,环境与健康关系研究都存在着很大的挑战。在生物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方面,受多因果关系的影

收稿日期:2011-01-06

基金项目:美国社会科学协会、中国环境与健康项目“环境健康风险的公众认知与应对策略——基于若干癌症村的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陈阿江(1963-),男,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

程鹏立(1977-),男,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

① 水俣病发生在1950~1960年日本战后经济恢复期和高速增长期。水俣镇的氮肥厂排放含汞废水至附近的河流和海湾,导致水中的鱼类和贝类受污染。当地居民长期食用受污染的海产品后,含汞有机物进入人体,被肠胃吸收,侵害脑部和身体其他部分。“患者由于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精神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参见彭俐俐.世纪环境警示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响,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争议很大,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结果。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医学研究的困难常常导致法律上的证据认定的困境,众多的“癌症村”、“怪病村”大多还是停留在新闻报道或“传说”的层面,很难找到被法律认可的证据。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许多的环境诉讼案例,最终难于胜诉。^①以村民现有的受教育程度和科学素养,去客观全面地认识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之间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关系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另外,就农村受污染地区而言,村民在获取相关信息方面也存在着诸多障碍。比如,污染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考虑也常常故意封锁相关污染信息,政府相关部门信息发布的延迟和不透明,使村民对环境健康风险的判断和认知更加困难。

虽然普通民众在环境健康风险认知方面存在困难和障碍,但是,他们并没有如我们所简单预设的那样处于“束手待毙”的状态。实际上,他们根据自身的条件及生活经验与实践智慧,在有限的信息和有限的科学认知条件下,采取了相对有效的规避健康风险的各种策略和措施。

本文尝试在以往经验研究基础上,探讨普通村民的化解策略。经验资料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一是笔者在许村的长期观察与体验。许村是江浙边界的一个28户110余人的自然村落。长期以来许村一直是笔者的“固定观察点”,包括早年的乡村工业发展及近年来的水污染问题。2010年夏,笔者就环境—健康主题,对在村的、30岁以上的人群给予了特别关注。二是笔者对西桥村的调查研究。西桥村是浙北的一个行政村,其中的第4、5组(丁浜自然村)因受工业污染癌症高发而被称为“癌症村”。从2005年起,就环境社会学主题我们已在此村进行过四次调查,最近的一次调查是2010年12月,就“环境健康风险的公众认知与应对策略”进行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在内的实地调查。本文关注的重点是非癌症高发情形下居民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认知及采取的策略。三是2010年12月“环境健康风险的公众认知与应对策略”研究课题在江西上饶润南村、广东韶关北坝村、冷桥村等地^②的调查^③。本文拟在以往大量的经验研究基础上试图超越案例研究,从一般意义上分析农村社区居民在现有条件的局限下,是如何应对和化解外来环境健康风险的。

一、污染致病的认知与信息障碍

因环境污染导致疾病高发的农村地区,普通村

民对污染与疾病之间关系认知的根本性障碍是污染疾病科学关系不清和信息不全。在日常生活中,当村民感觉水的颜色不对、水有异味等异常情况发生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就存在诸多的困难。比如,是谁在排放污染?水中含有多少污染物?浓度是多少?污染物可能产生哪些危害?如果喝下这样的水,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如果用于农业灌溉,是否会产生危害?水中的鱼类,是否可以食用?如果食用,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危害等。当然,这些问题中,有些涉及到科学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也有一些确定的基本科学知识。单就确定的科学知识而言,村民了解得也比较有限。

污染所牵涉的知识,往往涉及到专业领域,而这对于普通村民来说,存在较大的局限。以水污染为例,首先,进入水体的污染物的种类非常多。如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因企业生产的产品和工艺流程不同,排放的污染物也各种各样,有的虽然颜色很明显,但是毒性不强;而有的虽然没有明显的颜色,却毒性很强。污染物进入水体后,又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化学反应与生化变化。因此,要想弄清楚,哪些污染物质会导致人体健康受损、以及具体的危害程度等等,是十分困难的。^[4]在以往污染致病的案例中,像日本水俣病那样,非常清楚地找到并确定了甲基汞是居民致病的原因案例,在污染致病的医学研究上属于特例。即使是水俣病这样污染与疾病关系存在比较清楚关系的案例,其结果得到法院的最终认定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5]从环境健康史的角度看,类似于日本水俣病这样清晰科学关系的案例在现实中是少之又少,而多数的情形是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并不很清楚。

除了科学认知本身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外,信息不透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污染的施害方企业来说,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获取最大利益,

^① 如罗亚娟研究的东井村案例中,369名村民联合起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聚龙化工厂赔偿他们因受工厂污染而受到的侵害。但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都因村民不能举证污染损害事实的存在而判决村民败诉。在科学上对污染致害的事实尚不清楚的大背景下,要由村民来证明某些连科学家也难搞清的因果关系,是不公正的。东井村的环境抗争案例表明,因科学认知的困难致使司法系统无所适从,而村民最终承担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参见“罗亚娟.乡村工业污染中的环境抗争——东井村个案研究[J].学海,2010(2).”

^② 依照学术惯例,本文涉及的地名、人名均进行了技术处理。

^③ 有关“癌症村”的研究,参见笔者的《“癌症—污染”的认识与风险应对》(《学海》2011年第3期)。

存在不达标排放或者污染偷排的现象。基于这样的目的,不达标排放或污染偷排的企业当然不会把相关的污染信息公布于众,在这样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往往扮演的是企业的合作者。在东井村的案例中,聚龙化工厂是由当地镇政府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在建厂之初,“镇村两级干部以及化工厂的负责人向村民承诺,化工厂生产的是不会造成污染的感冒胶囊等生活化工产品,化工厂的水采用循环使用技术,一滴也不外流,对周围的水源和空气没有任何污染”。但是很快,村民就发现自家产的稻谷煮出来的饭都有化工厂的味道,村民都不敢吃了。^[6]

就制度建设而言,政府还没有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明晰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规定了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相关的责任部门应及时而明确地向公众发布信息;另一方面,明晰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够保证公众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公众可以主动规避风险。但目前环境信息披露严重滞后。这里存在某些地方政府因利益“悠关”而知情而不报的,更多的是制度建设滞后于现实的发展。比如目前争议很大的垃圾焚烧发电。“主烧派”认为,垃圾焚烧的技术是成熟的,并常引日本、德国为例,说明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但“反烧派”人士则指出,中国对环境污染的信息与监管制度是不可与日本、德国同日而语。我们最近对某焚烧发电企业的调查表明,国内目前只有少数几家机构掌握二恶英的检测技术,而且检测费用很高,所以工厂排放二恶英的实际状况主管部门也知之甚少,相关的监管制度阙如,遑论普通民众了。

由于媒体发育及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村民可通过一定的路径了解到相关的信息的。比如,电视等媒体在农村的广泛存在及深远影响,村民也经常从媒体等途径获得一些信息和知识。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该台的“焦点访谈”及“新闻调查”等栏目调查分析了大量的案例,宣传普及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我们调查时,常常会听到村民引用中央电视台某节目作为权威话语,说明或解释当地的情况。

二、“熟人社会”中的信息共享

影响公众风险认知和应对的因素很多,信息共享和沟通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农村社区,受社区结构和村落文化的影响,村民对环境健康风险相关信息的接收和处理深受“熟人社会”的

影响。在乡村社会,由于“熟人社会”中信息沟通的特殊性,降低了环境—健康风险。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中国乡土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方性,“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受这种地方性的限制,在村落内部,人与人之间彼此十分熟悉,村落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个熟悉的社会,村民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和文字。村民之间的亲密感觉是“习”的结果,“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7]。

“熟人社会”是一个沟通良好的社会。村落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信息量虽然小,但是有限的信息却是十分透明的,信息的传播速度快,信息的共享程度也很高。在“熟人社会”里,谁家都没有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因此,可以说,乡村社会的有限信息具有无限沟通的特点。中国目前的农村社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再是一个理想类型的“熟人社会”。但是从村落内部的信息沟通看,“熟人社会”的特点依然保持和利用着。这一点与城市社区的“生人”格局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城市社区,虽然大家住在一栋楼里,彼此之间构成所谓的“邻居”可能一辈子都不熟悉,甚至不知道邻居的姓名。

在“熟人社会”里,特别是与公共安全相关的事件,或涉及所有村民的公共事务的,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共享程度也非常高,信息也非常透明。比如村落里像“火灾”等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传播和行动起来。关于一些新奇的事,常在村民之间反复咀嚼、讨论,直至烂熟于心。比如,“张三家的舅舅在某公路上遇到了车祸,送医院了”的信息传到了村子里后,村民之间反复说起,到最后,几乎每个村民都知道了张三的舅舅住院及相关的情况。这个事情整个夏天都在村子里反复提起、议论。这样反复地讨论,并与随后传来的有关公路上的事故联系起来。村民不断地假设、推论,最后得出他们自己的认识:

新公路修得太好,车开得太快,特别是外地的车……

上年纪的、骑三轮车的人,过公路时一定要下来推车过马路,宁可慢一点……

最后,“骑三轮车的推着过马路,宁可慢一点”等几个关键信息几乎家喻户晓了,慢慢成为村民应

对公路交通风险的共识。

在工业污染较严重的农村地区,与污染相关的信息的传播也具有类似的特点。比如,常常在化工厂上班的关某,发现肚子里长了个瘤,到医院检查,医生说需要手术。于是,信息在村民间传递,并不断提起,反复讨论。到最后,几乎每个村民都知道关某住院、手术,以及关于化工厂与疾病之间可能关系的种种推测,并且进行一些延伸话题的讨论。比如,关某的病是否与他在化工厂上班有联系?恢复健康以后是否还应该继续去原来的化工厂去上班,还是换其它地方上班?其它在类似这样的化工厂里上班的人,是继续下去还是进行调整?

总之,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对村民来说,外来信息有限,但有限信息的共享程度却比较高。这有助于村民规避环境健康风险。当然,随着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熟人社会”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社区的分化一方面表现在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带来的差异;另一方面表现在同一社区不同群体的差异。在经济比较发达、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农村社区逐渐缩小了与城市社区的差异性。由于电视、电话、网络等大众媒体的普及程度高,农村社区接收外界信息的量和途径不断扩大。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虽然农村社区的开放程度也在逐渐提高,但是总体进程还比较缓慢。另外,即使在同一农村社区,村民不同群体的分化程度也比较大。这种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包括受教育程度、生活阅历等。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外部信息渠道正在朝多元化、高密度的方向发展,这些特点增加了“熟人社会”的信息来源。外来信息进入村庄之后,年轻人的信息传播方式既受“熟人社会”结构的影响又有现代技术的特征,而中老年人则基本上仍然按照“熟人社会”的特点进行传播。“熟人社会”利用社区的社会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应对了信息不足的困境。

三、外源性健康风险的化解之道

目前农村地区比较大的环境健康风险,主要是来自外部的“陌生世界”的污染。“传统社会”中的各种村落事务,村民可以应对自如,这不仅是因为熟人社会里信息是透明的,而且也因为村落社会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有效的规则和秩序。比如,面

对乱扔垃圾的越规举动,村落发展了一套严格有效的办法去应对,虽然会有越轨者,但总体上可以达成社会的目标。但当外在于村落的工业污染大肆进犯村落社区时,村落内平时有效的规范却难以约束外部世界的污染。^[8]

在难以制止或消除外源性污染的情景下,村民是否会对因污染而产生的健康风险置若罔闻呢?我们发现,村民应对环境健康风险,虽然有一定困难,但态度却是积极的,且村民探索和实践出一套实用的办法来趋利避害。这样的办法,我们把它简称为“化解”——当村民意识到污染可能带来健康损害时,会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或已有的知识尽可能把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风险降低,把污染对身体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化解”本意是“消除、解除”的意思。在中国的太极拳中,“化”有专门的含义。它指的是在推手时,在相互粘随的运转中以巧制胜。当有外力过来时,既不消极等待使自己被动受缚,也不激烈对抗外来之力,而是避开对方进力的锋芒,使对方失去着力点,再寻找机会后发制人。就村民对污染疾病风险采取的策略而言,化解既不是简单的、消极的回避,也不是正面的积极的或激烈的对抗,而是应用自如地让所来之力沿着它该去的方向化而去之。看起来有逆来顺受的味道。当污染来的时候,虽然有“顺受”的意蕴,却还是努力使所来之污染顺而化之,努力把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风险降低到最小限度。

在科学知识匮乏的时候,村民主要运用常识来规避风险。常识告诉我们,如果饮用有毒有害的水或食物,就有可能导致疾病。所以村民最常用的手段是不吃或少吃有污染、进而有健康风险的食物或饮用水。如村民发现河水有异味时,他们就改用井水作为饮用水,只在河里洗衣服、洗菜等。讲究一点的村民,在河里洗完菜以后,还要回家用井水冲一冲。当他们发现河里的鱼因污染有异味的时候,他们尽量不吃鱼,而改吃其他食物。为了把污染可能带来的对身体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他们通常会出售认为有风险的粮食和蔬菜。西桥村的村民因为怀疑自家种植的水稻和蔬菜中污染物含量高,异味大,不再食用自家生产的稻米和蔬菜。^[9]有的村民因为担心河水源污染而影响蔬菜,自用的蔬菜用井水或自来水浇灌,以规避风险。

村民也在实践中摸索和发展着他们自己独特的规避健康风险办法。2010年暑期笔者在许村短住,见好几户人家在陶缸里种慈姑,因好奇而与村

民尚聊起来,却发现另有秘密。下面的一段对话显示,在农村社会里也有一些极其细心的人是如何关注健康问题的。

问:在缸里种慈姑,能长多少?(言语之下,城里因为没有土地才会用此办法,而农村里的水沟水塘很多,缘何要用此“袖珍水塘”。)

答:一个缸收一两斤慈姑总会有的吧!我那么多缸,收上十斤,就足够我们家吃的了。

问:那你不如在水沟里种,只要种上一点,就够你们家吃的?

答:那不一样,水沟不干净。

问:为什么?

答:你没看见,井台上洗东西的水,洗衣粉、洗涤剂等化学的东西全都流到这水沟里了。

按照费孝通的说法,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呈“差序格局”^[10]。确实,村落社会中的亲缘、地缘关系结构仍然影响和制约着村民的行事方式,包括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规避。我们注意到,通常家长不让年轻人去一些污染较重的工厂上班,不仅考虑年轻人自身,而且考虑他们的下一代。如果某某家的孩子去化工厂上班,首先是他的家长会仔细权衡。遇到不精明的家长,他们的近亲友邻会及时提醒。实在没人提醒时,村落里总有“爱管闲事”的人,聊天是时候会说,某某家的孩子去化工厂上班划不来,即使工资高也没有意思,因为说不准将来会倒霉。许村的老金一直在的化工厂上班,收入很不错,后来他的孩子也跟着去该化工厂上班。上了一段时间班后,小金又放弃了这收入较高的化工厂而去了收入一般又比较辛苦的纺织厂上班,规避健康风险是其重要的原因。

除了村落社会中的亲缘地缘关系结构,农村社会中的精英—大众结构也影响着村民环境健康风险的规避。罗吉斯等人的研究发现,新技术或新发明在乡村社区的传播与革新精神和受者类型有重要关系。受者类型根据革新精神被分为革新者、先进受者、先进多数、落后多数和落后者。在这五个受者类型中,革新者虽然是专家,但并不是邻居的意见领袖。在社区内,先进受者是地区性的,是地方系统中的一员,他们常常成为加快传播新技术过程的关键人物。^[11]笔者先前的研究也发现,技术使用者精英是乡村社区技术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中介人物。健康知识和健康风险的规避也遵循从精

英到大众的逻辑。人民公社时期培养的“赤脚医生”对村民的影响非常大。“赤脚医生”虽然没有掌握太深奥的理论,但因为他们在农村,除了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状况,对农村的现实有深入的观察,也因为与他们能用村民明白的语言解释村民关心的事宜,所以,“赤脚医生”的解释往往能成为村落中的经典。比如,“赤脚医生”曾经建议他爱吃河蚌的亲戚说以后不要再吃河蚌,因为化工厂的毒素都被河蚌吸着并累积起来了。类似这样的话,很容易在村里传播,并逐渐影响和规范普通人的做法。到某个时间,村里就没人敢吃河蚌了。

事实上,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农村社区除了精英大众的分化,代际的分化也日益显现出来,其中年轻人群体与中老年群体的分化更为突出。年轻人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与外部社会接触比较多,善于接受和使用新科技,能很快地了解和接受环境污染与健康问题的认识。中老年群体的新科技往往是从年轻人群体那儿“反哺”过来的。中老年群体则善于利用地方性知识,从实践中探索性地解决问题。

分析村民应对环境健康风险的措施,我们发现,村民对污染危机的应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安排缺失而在实践中摸索的策略,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村民尽最大可能化解环境健康风险,但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即使在这些“化解”策略中,也是科学与盲区共存。村民只有少量相对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地方医生、地方精英,以及电视、报纸等。但是,科学知识储备的不足和有效信息的局限性,导致村民不能完全有效地、科学地应对环境健康风险。村民所采取的措施,有一定的效果,但有局限性。

四、结论

理解农民是如何化解环境健康风险,应该避免客观主义或局外人的眼光,认为村民在应对现代工业污染时是完全被动的、举步无措;也应该避免主观主义或局内人的眼光,认为村民的行为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实践,不受超个人的集体的影响。实际上,村民在应对外来环境健康风险时,有着自己的一套实践逻辑。村民的真实认知及规避环境健康风险的策略逻辑不是“外人”或一般人所看到的表面上的逻辑,它一方面来自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积

累,是历史在人身上的体现;另一方面,这种策略又受到村民生活的“熟人社会”社区的场域影响。认识这种实践逻辑,需要研究者从村民的现实生活角度出发,通过参与性对象化的过程来展开分析。

环境健康信息及知识是村民应对环境健康风险的前提。对村民来说,无论是工业污染,还是各种疾病,都是比较陌生的事物,而相关企业故意隐瞒污染信息,政府部门对相关信息发布的制度建设不完善,都加剧了村民在应对环境健康风险时的认知障碍。但“熟人社会”对于村民来说拥有较多的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在共同面对外来环境健康风险时,村民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的社会网络,使得有限的污染信息在村落内迅速传播,有限信息得到无限利用,以减少健康风险。

就现代科技与日常生活知识与经验的对立问题,“后”学者多有批评与反思。人类学家吉尔兹倡导深描的阐述性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给予了特别的强调,他甚至把常识与宗教、科学与意识形态并行起来谈论^[12]。在面对污染可能致害时,当科学知识不足时,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常识却发挥了一定作用。当意识到水源或食物可能受到污染时,根据长期生活积累的经验,村民就会尽量避免接触可能受到污染的水或食物。这些经验已经内化,面对风险时,人们就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模式。诸如有村民在自家的陶缸里种慈姑的行为时,其他村民就会效仿。社区精英的创新做法,不仅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而且会迅速影响和扩散到普通民众。

How Do Villagers Defuse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CHEN A-jiang, CHENG Peng-l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Incomplete information resulted from the unclear scient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ution and disease, and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coupled with the lack of related scientific knowledge constitutes the obstacle for the villager's perception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However, villagers were not as usually presupposed as to be in the state of “waiting to die”. In rural communities, the villagers fully utilized the limited information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mechanisms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Therefore, the plight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was effectively addressed. Facing the external source pollution and realizing that they could not reverse the situation of pollution, the villagers defused health risks strategically according to their life experience and common sense. The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based on blood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elites-mass structure also helped avoid the risks for the villagers. Therefore, despite that villagers were lacking in scientific instructions to defuse the risks, they possessed their own unique logic in practice.

Key words: Health Risks; Acquaintance Society;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Defuse; Logic in Practice

参考文献:

- [1] Haritoshi Funabashi. Minamata diseas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005(15): 7-25.
- [2] 李钧德. 淮河支流: 污染造出一批“癌症村”[N]. 新华每日电讯, 2004-9-29.
- [3] 叶文添. 夺命 GDP: 盐城癌症村化工污染调查[N]. 中国经营报, 2006-4-24.
- [4] 陈阿江. 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75.
- [5] 程鹏立. 日本“水俣病”的社会学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 [6] 罗亚娟. 乡村工业污染中的环境抗争——东井村个案研究[J]. 学海, 2010(2).
-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9-10.
- [8] 陈阿江. 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东村个案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1).
- [9] 程鹏立, 唐争翠. 疾病与环境污染: 突破自然科学的局限[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4).
-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0-40.
- [11] 罗吉斯, 伯德格. 乡村社会变迁[M]. 王晓毅, 等,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262-267.
- [12] 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M]. 王海龙, 等,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96.

(责任编辑: 李二斌)